



绿釉陶狗 东汉 故宫博物院藏



皮影狗 清 南京博物院藏



褐釉泥塑狗 宋 南京博物院藏



青玉卧狗 宋 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簪花仕女图》中出现宠物犬形象 辽宁省博物馆藏

瑞犬纳福

□ 杨泓

农历戊戌年已来临，戌年的生肖是犬。在中国古代，对犬多加好评。晋人傅玄曾作赋咏犬，开篇就说：“盖轻迅者莫如鹰，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禀性兼二偶之劲武。”这里赞颂的对象主要是猎犬，古代又称“田犬”，它们自古就是猎手的忠实伙伴。已发掘的东周时期古墓中，曾在山西太原春秋赵卿墓的车马坑中和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陵的随葬坑中，都发现过同狩猎的马车葬在一起的田犬骸骨。中山王陵出土的田犬，颈上佩戴有金银制作的华美颈圈，表明主人对它们极为宠爱。

提起中国古代养家犬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在距今8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犬的遗骸。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的遗物中，曾发现有造型颇为逼真的犬形黑陶鬲。江苏邳县大墩子出土的史前陶屋门外侧有线刻的守门犬图像，表明当时犬已是人们信赖的家居守护者。史前艺术家更常以犬为描写对象，在湖北石河文化出土的大量小型动物陶塑中，犬是数量极多的一种，形体小巧，但形态颇古拙传神。

古人将犬列为“六畜”之一，畜犬的目的，不仅有上面讲到的用于狩猎的“田犬”和用于守护宅舍的“守犬”，更有用于制作宴席上的美味佳肴的“食犬”。例如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发掘的西汉软侯家族墓出土的“遣策”竹简中，记载用犬制作的羹炙类菜肴有五六种之多，并将成年的犬与幼年的犬区分开，简文中称成年者为“犬”，幼年者为“狗”，并分别制作不同的菜肴。

由于汉代畜犬之风极盛，所以当时的艺术家对塑造犬的形貌，倾注了很大注意力，不论是墓室内的壁画、画像石，还是画像砖的图像之中，都可见到姿态生动的家犬。最令人得以窥知汉犬真实形态的还是

随葬俑群中有关家犬的陶塑或木雕模型，其时代最早的作品出自汉景帝阳陵的俑坑之中，后来在帝王陵墓的从葬坑中还是平民的坟墓里，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或立或卧，但多是昂首瞪目的警觉的态势，有的陶犬被放置在陶宅院模型的门侧，明显是司守卫之责的守犬。至于犬的造型，有的如实摹写，肖形而生动，以河南辉县百泉东汉墓出土的陶犬为典型代表；也有的夸张变形，着力刻画其瞪目张口呲牙的凶相，借以吓退地下的邪鬼，保护墓室的安宁。至于甘肃武威一带东汉墓中的木犬，则用极简洁的刀法，刻出大体的粗略轮廓，稍施彩绘，呈现出拙稚纯朴的美感。

汉代以后，直到隋唐，犬一直是墓中随葬俑群中持久存在的家畜造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身姿和特征有所改变。唐代的陶犬造型，以尖喙长体的田犬最引人注目，在乾陵陪葬的一些太子和公主的墓葬中，不但有描绘田犬的壁画，而且还在永泰公主墓随葬俑群中出现猎手携带田犬的骑猎俑，将田犬载于马鞍后，人、马和犬的姿态互相配合，极生动传神。在隋唐时期，随葬俑群中又流行十二生肖（十二辰）俑，其中的戌犬，则都塑成身穿袍服的人身而有犬首的神奇形貌。

也是在唐代，看来作为宠物的具有观赏价值的名犬，已为宫廷仕女所喜爱，传为周昉所绘《簪花仕女图》卷中，就绘有这类宠物犬的图像。作者佚名的《宫乐图》中，仕女围坐的大桌下，也伏有一只小巧的宠物犬。

直至今日，人们饲养宠物犬的热情不减，品种日众。所以犬的造型成为民间工艺美术品中经久不衰的题材，有关的剪纸、年画、泥塑以及布艺制品，都一直为人们所喜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狗形鬲 新石器时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十二生肖图——狗 任预（清） 故宫博物院藏

花开盛世

□ 赖睿

新年之际，“花开盛世——中国美术馆藏花鸟画精品展”如约亮相，为京城春节增添一抹色彩。

以花卉草虫、禽鸟畜兽、蔬果水族等动植物题材为主要内容的花鸟画，自中晚唐时期逐渐从人物画、山水画的衬景中脱离出来，并在借鉴人物画、山水画之长的基础上独立成科。

宋代迎来了花鸟画繁荣发展的高峰期，涌现出赵昌、崔白、赵佶、扬无咎、李迪、林椿、赵孟坚等一大批杰出画家，为后世留下大量花鸟画珍品，在中国绘画史上产生深远影响。

到了元代，花鸟画在承继前代院体基础之外，还出现水墨花鸟画，即墨花墨禽，侧重于笔墨技法的探求，使花鸟画变得更为潇洒恣逸，且与诗、书、画融为一体。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钱选、李衍、赵孟頫等，在水墨技艺上下功夫，成为明清水墨写意画发展的重要铺垫。

进入明代，以林良、陈淳、徐渭等人笔墨简约、泼辣豪放的水墨写意花鸟画最具代表性。写意花鸟画在清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或笔墨圆浑厚重，色彩鲜明，或以书法篆刻金石用于绘画，笔墨苍老厚重，气势雄浑，对于民族传统花鸟画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近现代以来，花鸟画得到长足发展，以任颐、吴昌硕、齐白石、陈师曾、于非闇、徐悲鸿、陈之佛、刘海粟、潘天寿、林风眠等为代表的艺术家不断推陈出新，或立足传统，或以西润中，或中西结合，或依中而变，致广大，尽精微，将花鸟画的构图、色彩、笔墨、内蕴不断拓变革进，也使花鸟画的抒情性、表现性、象征性、文化性得到发展与深化。

花开太平世，美在新时代。走进这些鲜活的作品，走进一部人类心灵观照自然的艺术画卷，感受时代春意。



芭蕉黑猫 徐悲鸿

物逐新年气象新

□ 王锦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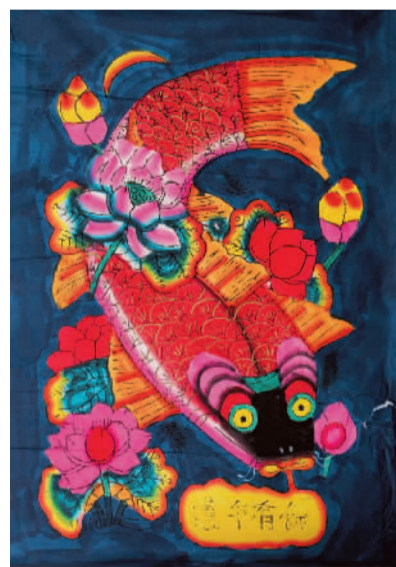
陕西千阳张海布艺作品《五毒老虎》

民间工艺美术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闪烁着独特的东方魅力。寓意新年的民间工艺美术，如年画、泥人、窗花、布艺、彩灯等，真实地存活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是生活的艺术，既可作实用物，又可美化生活，既有装饰效果，又蕴含吉祥喜庆之意，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唤起民族文化自觉和民族文化认同。今天，了解优秀民间工艺美术所体现的自然之美与人文精神，才能更好地进入和触摸中华民族的审美之源。

年画祈福

最具“年味儿”的民间工艺美术莫过于年画。起源于“门神”的年画，在绘画方面发展了年节的民俗文化信仰与民间传统。年画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造纸术”与“雕版印刷术”的绝妙结合体，在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十分清晰地描绘出农耕时代人们的精神向往，生动刻画了岁月长河中社会生活的世态百相。

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多以辟邪纳福、祥瑞吉利、民俗风情、小说戏文、风景花卉、美人童子等为题材。“五子门神”张贴于屋门上，以祈求富贵吉祥、子孙兴旺。《金玉满堂》张贴于炕头墙上，寓意财富极多，也形容学识丰富。运用象征、寓意、谐音体现主题是民间艺人的拿手好戏。如莲谐音是连，牡丹花象征富贵，蝠与福是谐音，桃子、佛手象征寿。



天津杨柳青年画《莲年有余》

杨柳青木版年画区别于其他年画的突出之处，是有大量的款题文字。历代画师们在创作年画时为了补充和丰富画面、阐释主题，以题款的方式在画面下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这些文字大致可分为画题类、诗词类、歌谣类、白文叙述类、人物对话类等。

窗花贴福

北方乡村的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从较剪纸、贴窗花开始的。艺人们用大红纸铰出的剪纸作品，象征着年节的喜庆、吉祥，古老的纹样里蕴含着丰富的生命记忆，接续着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主题和民间叙事方式。用一把剪刀在红纸上剪出落英缤纷的各式图案，贴在窗户上，这种剪纸作品又叫“窗花”。

高风莲出生于黄河九曲十八弯的陕北延川县，是黄河文化孕育出来的农家能人与民间巧手。她的剪纸、绣花、布堆画等多种样式的民间艺术作品，气势磅礴，气韵贯通，流动着黄土高原特有的质朴

粗犷、生生不息的生命气象。

河北蔚县周兆明的窗花以花鸟鱼虫、戏曲人物居多。儿时的周兆明靠创作剪纸常常能给自己换些糖吃。成年后的周兆明用刀流畅不留刀痕。他手下戏剧人物的胡须细而不乱、长而不断、几十层的宣纸一刀下去，不偏不斜，人物表情栩栩如生。作品透着诗一般的美与童话般的趣味。

“泥人”求福

中国人对手捏泥人有着特殊的感情。捏制泥人或制作泥塑成为中国最普及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至今，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和鹤壁市浚县的庙会上，仍然可以看到淮阳泥泥狗和浚县泥咕咕等民间工艺品的现场制作表演和售卖。淮阳泥泥狗的半人半猴、人兽同体，九头鸟、双头狗，以及“猴头燕”“人面猴”等等奇异禽兽造型，具有原始宗教文化特点，伴随着古老的民俗活动，历数千年至今，成为年俗文化的民间集体记忆。

“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锴，在继承传统泥彩塑艺术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姊妹艺术，通过夸张、变形等手法，形成了造型独特、形色统一的现代装饰风格。他的《西鸡丰康》《子鼠大吉》等十二生肖题材系列作品，创造性地将十二生肖的动物形象与少数民族孩童形象结合在一起，寄予新年的美好祈愿。

布艺纳福

布艺是通过飞针走线、描红绣花，将设计的花纹在纺织品上形成花纹图案的一种工艺。布艺设计常取自万物万象，凝聚着妇女群体的智慧和经验。

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未成年男女都是佩戴香包的。汉文化重镇徐州的手绣香荷包已广泛运用到岁时年节等民俗生活中。徐州香包多纯手工缝制，又富有古韵汉风，表现喜庆吉祥题材，造型生动、简洁、质朴、极具装饰性，局部刺绣恭谨细腻、神形兼备，代表性的香包艺人有井秋红、王振侠、杨雪梅、孟宪云、冯宪花、李清富、冯瑞珍、王秀英等。